

新华社银川7月11日电(记者王磊、张亮、马丽娟)85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西北“红区”采访4个多月,撰写的《西行漫记》风靡全球,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斗志昂扬的红军形象冲破重重封锁,首次亮相世界。在这本书中,斯诺把相当的篇幅给了黄土高原上一座小城——宁夏豫旺县。在这里,他见到了“真正的红军”,并为之倾心一生。

历史虽已远去,信仰烛照人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这是当年斯诺西行前脑海里的疑问。85年后,新华社记者重走斯诺之路,来到这座已经更名为同心县的西北小城,追寻中国共产党人持续百年不变的初心。

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夏,宁夏豫旺堡厚厚的古城墙上,一名红军战士面朝旭日吹起嘹亮的军号,身后红旗迎风招展,埃德加·斯诺举起相机,定格了这一幕。不久后,以这张经典照片为封面的《西行漫记》震惊世界,英姿勃发的小号手,及其象征的年轻“红色中国”,向世界传递出奋发不屈的“抗战之声”。

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遭到国民党漫长而严密的封锁,几乎与世隔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被污蔑为“流寇”与“土匪”。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作为驻华西方记者,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长途跋涉至陕甘宁边区,深度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结束在陕西的采访后,在他和毛泽东正式谈话中充当翻译的吴亮平劝他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

大概两周后,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扎地豫旺县。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红军”。

“我在宁夏和甘肃所看到的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斯诺发现,红军普通士兵平均年龄是19岁,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勇敢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当时军阀统治下的豫旺县极度贫困,斯诺记录了一份他看到的调查报告:“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迫使许多农民卖牛卖田……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糊口。”红军解放豫旺后取消了一切税收欠债,很受农民拥护。

如今同心县马高庄乡沟滩村杨家堡子里,一排废弃的土窑洞诉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往。这里曾是西征红军后勤部,70岁的堡子主人杨振华还记得他爷爷常挂在嘴边的话:“红军是为咱穷苦人打天下的。”

起初豫旺县许多村民一听说红军来了,纷纷躲了起来,后来发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糟蹋老百姓的庄稼,“我爷爷称赞说真是人民的好军队,就捐粮、捐羊支援红军作战。”杨振华说。

在西征前线,斯诺被准许进行不受限制的采访,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

新『西行漫记』走笔

重走斯诺之路看变迁

的足迹遍布豫旺县。长期研究这段历史的宁夏党史专家杨文元认为,这次采访让斯诺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理念深深打动了斯诺,经过此次西行也让他由‘一二·九’运动时的旁观同情,暗中支持转为旗帜鲜明地公开赞誉。”杨文元说。

百年初心如磐

85年后,记者踏着斯诺的足迹再访这座红色小城,昔日红军西征的炮火硝烟早已消散在历史中。多轮扶贫开发,让红军西征故地一眼千年,沧海桑田。

在斯诺的照片里,同心县的地貌如火星表面一般干旱荒凉。而如今,经过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同心县昔日的旱原草木葱茏,满眼翠绿。拔掉“生态之困”这个最根本的穷根子,同心县走出一条“旱原披绿、产业多彩、农民增收”的脱贫致富新路子,红枸杞、紫葡萄、壮牛羊、小杂粮等致富产业“茁壮成长”。

走进杨家堡子,杨振华家白墙红瓦的新居格外亮眼。2014年,杨振华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府8000元产业扶贫资金支持下他养了10只羊,每年享受养殖和种植补贴。随着羊的数量不断增加,伴随老杨大半辈子的“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彻底改变,如今收入稳定而有保障。

最让老杨感激的是,他们全家在政府补贴下缴纳了基本医保,几年前老杨妻子两条腿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总共花了8万多元,报销后他只掏了不到8000元,“没有共产党,我

新华全媒头条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清水河水系环绕下的县城(无人机照片,6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小号手雕塑(无人机照片,6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老伴儿后半辈子就只能瘫在炕上了!”

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老区人民的倾力支持,老区的发展更需要特殊的关怀。在中央的制度安排下,中核集团在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制下帮扶同心县,福建省泉州市在闽宁协作机制下对口同心县。央企巨头和沿海发达地区“同心”协力,带飞同心。

进入盛夏,福建永春县从事蘑菇种植的企业家陈世文在永春当地的生产基地因为高温已经停产,而在同心县下马关镇南安村的菇棚里,陈世文去年开辟的“第二战场”正值出菇旺季。“福建热得出不了菇时,宁夏的气温正好适合菌菇生长。这样我就能基本实现全年不间断出菇了。”陈世文说。

陈世文的到来,让南安村建档立卡户马忠梅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元的稳定工作。“以前都很少吃蘑菇,更别说种了。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基本掌握了菌菇种植技术,未来计划承包

几个大棚自己创业种蘑菇。”马忠梅说。

同心县,这个曾经“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糊口”的地方,现在的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万余元,老百姓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得到极大改善。

从20世纪70年代起,宁夏实施扬黄工程,同心县部分地区摆脱水困。今年6月30日,投资23亿元的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全线贯通,甘甜的黄河水经过滤后直达同心县城和中西部乡村百姓家中。

水沁旱原,生机涌动。昔日的豫旺终于“旺”了!

信仰穿越时空

夏日炎炎,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里游客络绎不绝。斯诺经典照片“抗战之声”里的那个红军小号手谢立全的形



3月25日,位于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境内的宁夏固海扩灌扬水更新改造工程一泵站顺利通水试运行(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象已经被塑成雕像,不少年轻人在此合影“打卡”,寻访百年未变的初心。

同心县河西镇旱天岭村,村支书丁建华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这几年,旱天岭村靠养牛脱了贫,丁建华硬是练成了“牛保姆”“牛司令”,接生、治病、选犊,村民一个电话,他随叫随到。而他自己,却从存款百万元的包工头变成身患脑瘤的“小老头”。

旱天岭全村脱贫后,丁建华又有了一个小目标,就是让全村人家家住新房,户户有小车。“如果老天暂时不要我的命,我就一定要实现这个小目标。”他说。

西征故地今何在?迈向振兴新征程。乡村振兴新的长征路上,同心县越来越多年轻人受红军精神的影响和感召,回家乡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续耕同心新的篇章。

同心县预旺镇南塬村,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曾在这里召开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热烈欢迎斯诺等人。25岁的南塬村村民张治飞打小就听过斯诺的故事,大学期间他入了党,并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参与了村志的编写,从老人口中听到了更多西征红军的故事。

大学一毕业,张治飞放弃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村带动村民科学养鸡。根据相应非洲国家的需求积极推动鸡棚检查温度、湿度和小鸡生长情况,但他不觉得苦:“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不算什么。”

85年前,19岁的小号手谢立全吹响的青春激昂之声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在这片斯诺探访过的土地上,在巨变的山乡间,在老百姓的心坎里,红军小号手那仿佛可以穿越时空的号角依然嘹亮,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朝气蓬勃。

从3000万到零病例,我国卫生事业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获得消除疟疾认证的中国,还贡献出智慧和方案助力全球抗疟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沐轶城)2021年6月30日,我国获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国家消除疟疾认证,成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疟疾俗称“打摆子”,是一种经蚊叮咬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蚊媒传染病,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的全身发冷、发热、多汗,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我国从20世纪40年代每年报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到如今完全消除疟疾,抗疟成就斐然。

本土病例从三千万到零: 抗疟成绩世界瞩目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约4.5亿人口中受疟疾威胁的人口在3.5亿以上,每年至少有3000万例疟疾病人。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包括疟疾在内的流行病横行肆虐,由于缺医少药,患了疟疾的贫苦大众饱受疾病折磨。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

我国曾出现两次大范围的疟疾暴发流行,最高峰出现在1970年,全国疟疾发病人数超过2400万。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防治历程推进,我国疟疾防控和救治能力显著提升,疾病负担大幅度降低。

“2003年到2012年,疟疾发病例量从较高水平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逐步从控制阶段走向消除阶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介绍。

2010年,《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出炉,我国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提出要在2015年消除大部分地区的疟疾,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

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连续3年没有本土疟疾病例,并建立有效的疟疾快速检测、监控系统,制定疟疾防控方案,才能获得消除疟疾认证。

2017年,我国首次实现零本土病例报告的重大突破,至今已连续4年无本地原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这背后凝聚着几代中国疾控人的努力,消除疟疾认证反映了中国疾控事业的卓越成就。

对于我国获得消除疟疾认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的成功来之不易,是经过几十年有针对性的持续行动才取得的。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行列,向世界表明无疟疾的未来是一个可行的目标。

从青蒿素到“1-3-7”工作规范: 防控经验被世界认可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我国启动国家疟疾防治项目,旨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新方法。中国科研团队克服各种不利条件,经过大量实验,发现了青蒿素。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00年以来,世卫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时至今日,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法,

在过去的20多年间,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

周晓农介绍,2010年后,我国走上疟疾消除之路,建立全国疟疾网络报告系统和实验室检测网络。

在与疟疾的长期较量中,我国完善了疟疾媒介监测和疟原虫抗药性监测体系,制定“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工作策略,探索总结出“1-3-7”工作规范。“1-3-7”工作规范突出强调时间概念,即要在发现疟疾病例后,1日内进行疟疾病例网络直报,3日内进行病例复核及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日内进行疫点调查及处置。

周晓农说,2014年,我国在坦桑尼亚启动覆盖4个社区共20万人口的试点项目,并把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的经验应用到当地。

“我们刚去的时候,当地发病率在30%到40%,经过约四年努力,发病率下降到5%以下,下降幅度达到80%以上。”周晓农说,试点项目受到当地人民欢迎,同时也获得当地政府与专业人士的认可。

目前,“1-3-7”工作规范作为全球消除疟疾工作新范式,已经被正式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 抗疟援助不缺位

作为全球重大传染病,疟疾长期威胁着人类健康。据世卫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报告2.29亿疟疾病例。其中,非洲地区集中了全球90%以上的疟疾病例。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疟疾发病与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卫生系统完善度和居民知识水平直接相关。

有人称,疟疾更像是一种“贫穷病”。消除疟疾难以单纯靠发展中国自身力量,更需要紧密的全球协作。目前,我国已通过多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疟援助。

在坦桑尼亚,中坦合作项目免费为身患疟疾的居民提供检查、治疗,并向他们提供蚊帐,已经服务数万当地民众。2019年,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下,中国与坦桑尼亚将试点区域从4个社区扩展至10个社区,以进一步验证中国经验的适用性。

目前,中非在抗疟产品领域的合作主要依托多边合作框架,推动疟疾诊断试剂、治疗药品、长效杀虫蚊帐等通过世

卫组织预认证进入非洲市场。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韦晓宇说,应该充分发挥中国抗疟产品和技术的竞争优势。根据相应非洲国家的需求积极推动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青蒿素类抗疟药、长效杀虫剂采购,帮助他们使用中国的抗疟产品,推动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公共采购市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帮助非洲的疟疾防控工作要持续开展。”周晓农介绍,不仅要把中国经验分享出去,还要建立队伍帮助其他国家。

据介绍,我国正在培训省级疾控中心,培养建立专业队伍,参与非洲疟疾高发地区的防控工作。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人员在非洲开展疟疾治理工作。

世卫组织全球疟疾项目主任佩德罗·阿隆索表示,几十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在本国应对疟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在全球产生了显著的连锁反应。

随着中国的产品、技术、人才和方案走向世界,中国将继续为全球根治疟疾贡献出智慧和方案。